

“查开房”泄露隐私 不能不当回事

上周,一个名为“查开房”的页面悄然现身网络。输入姓名或者身份证号,可以得到被查询者在某些快捷酒店登记的个人信息,如登记日期、手机号码乃至家庭住址等等,大批网友惊呼“被查房”。据报道,泄露的数据源于一家网络公司,其在上传和存储客户信息方面存在技术漏洞。目前,虽然相关网站已无法访问,但事件暴露出的信息安全问题不容小视。

身处大数据时代,任何一个小小失误都可能造成难以预测的蝴蝶效应。同类事件层出不穷:2010年,美国社交网站“脸谱”遭遇“泄密门”,约1亿名用户的个人信息被泄露;2011年,韩国社交网站“赛我网”的3500万用户资料被窃取,间接导致韩国网络实名制取消;今年初,中国人寿数据库信息泄露,近80万份投保人的保单信息被公

开……因信息安全问题产生的危害,远远超出传统意义上的侵权行为,成为全社会乃至全世界共同面临的系统性风险。

云计算、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使得网络对个人信息的采集更加便捷。除了身份信息,还包括人们在网上传输时产生的数据、在搜索引擎留下的历史记录、使用移动终端时上传的地理位置信息,等等。将这些数据汇总起来,可以相当精准地还原一个人的真实活动轨迹和生活面貌。1993年,美国《纽约客》杂志刊登的一幅著名漫画称,“在互联网上,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20年后的今天,有人打趣,就算一条狗在玩电脑,也会有人知道它在网上干了什么。而对这些信息的保护,显然还没有达到与技术进步同样的程度。

个人信息不但是公民的人格权利,也具有社会经济资源。“查开房”事件发生不久,有网友未雨绸缪地提醒:以后一段时间,各类直接针对个人的电话、短信类诈骗活动将迎来新的井喷。虽然语调调侃,但透露出一个事实:对公民个人信息的贩卖,已经形成灰色产业链。根据趋势科技去年和清华大学相关研究机构联合发布的《中国互联网信息安全地下产业链调查报告》,这条灰色产业链的整体盈利规模在2011年就已达53.6亿元,8%的网友曾在网上遭遇欺诈或被盗。对数据的争夺,在一些行业已经白热化。

也要看到,信息时代,我们不能因噎废食,而要刷新对数据和信息的认识。既要确保公民基本的人格权不受非法侵害,又要促进对个人信息资源合法合理的开发利用。如何让信息的使用、保存与流动保持在安全可控的范围,使信息化为人们带来方便

而不是灾难,是亟待破解的一道难题。

近年来,我国在立法保护公民个人信息方面可谓不遗余力。从刑法修正案(七)到侵权责任法,从居民身份证法的修订,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议》,一个涵盖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法律框架基本形成。然而,法律很难追上迅猛发展的现实生活,从长远看,需要在个人、企业、行业组织和政府多个层面,构建立体协同、动态发展的个人信息安全保障体系,从根本上遏制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安全的系统性风险。

早在1980年,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就曾预言,大数据将是“第三次浪潮”的华彩乐章。让浪潮把我们带往远方,而不是把我们拍死在沙滩上,需要政府、企业和每个公民一同筑牢防波堤。 任文平

“文物拆了重建”是瞎折腾

建于1912年的济南老火车站,曾被战后联邦德国出版的《远东旅行》列为最值得看的第一站。遗憾的是,它于1992年被拆除了。20多年过去,济南当局后悔了,决定由济南市旧城开发投资集团投资15亿元重建济南老火车站。济南市官方称重建后的济南老火车站将“原汁原味”地展现在市民面前。(10月23日《南方都市报》)

将不可移动的文物拆了重建,然后制造大批的“假古董”,这样的蠢事常常在当下的中国进行。不同的是,各地对这些劣劣折腾、“恶作剧”给出的名目不一样,有说是“维修性拆除”,如梁思成、林徽因故居被拆就冠之以这样的理由;有说是“保护性拆除”,如重庆蒋介石行营被拆就是这么说的;如今,济南又要“原汁原味”重建老火车站。

我不知道济南官方是如何理解“原汁原味”的意思的。按《现代汉语词典》解释,其本义是指食物原有的味道和汤汁。比喻事物本来的,没有受到外来影响的风格、特性等。难道济南官方的意思是说,重建后的老火车站将与德国人老费舍尔设计建造的一模一样?这可能吗?

据查得知,当年被官方视为殖民主义象征的济南老火车站被拆时,除了保留下来那口机械大钟,所有的建筑材料并未得到妥善保存,这样,即便找到了老费舍尔的设计图纸,今人也不可能用现代工艺、现代材料建造起一座“原汁原味”的老火车站。更何况,费舍尔在设计火车站罗马式圆顶时融入了欧洲人的宗教理念和信仰,因而赋予了整座建筑特有的宗教气息和风格。连词,让一群既无宗教信仰又无文化信仰甚至迷信畏文化遗产之心都没有的现代工匠来重建老火车站,岂能将其建造得“原汁原味”?

济南考古研究所所长李铭说得好:“建筑的灵魂最核心的因素是历史载体。济南老火车站见证了清政府的灭亡到民国的转变,到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掌管铁路,再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这段历史,它是一段可以触摸的‘立体的历史’。”重建后的火车站除了能见证今人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所犯的过错——用著名文物专家谢辰生的话说是,近20年文物破坏基于“文革”——再也无法见证那一段历史。也就是说,它已失去了历史载体的功能。魂魄已散,即便形貌再酷似,也只是徒有其表的“假古董”而已。

今人的蠢事已经做得够多了。如果说,当年作出拆除老火车站的决定是一错的话,今天作出的重建决定未必就正确。而一个大项目的上马,往往会让某些人中饱私囊,这也不得不防。故我建议,还是应该遵循《文物法》的规定:不可移动文物已经全部毁坏的,应当实施遗址保护,不得在原址重建。明智的做法是,在原址立一块碑,记录老火车站被毁的历史,告诫今人、后人以及官员们,再也不要犯类似错误。 王学进

增加保安 也无法确保行医安全

近年来,暴力伤医事件时有发生。日前,国家卫生计生委和公安部印发了《关于加强医院安全防范系统建设指导意见》。通过人防、物防、技防三级防护体系构建“平安医院”,以防止恶性“医闹”,比如将按20张病床1名保安标准实施。(10月23日《京华时报》(微博))

每20张病床配一个保安,是医院安保升级的信号。出现这种硬性要求,与近年来医疗暴力事件上升有关系。面对这一局面,有关方面作出这种回应,显出了管理的“急”。

但它也仅仅只是在拼“硬”力,带着一种以暴制暴的治理思维。让人担心的一种现象是,医院以为配备了防卫的保安,安全上就可以有备无患,因麻痹而放弃了解决问题的思想。这样的事件在南昌某医院并非没有发生过。

医患矛盾激化,医疗纠纷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暴力伤医事件此起彼伏,意味着原来的管理模式已经不足以应付这种新变化,失去了公信力,这才是暴力伤医事件剧增的根源所在。如果不顺应这种变化,拿出更多有力的办法解决医患信任 and 关系冲突的麻烦,单方面的安保升级,也不足以解决“闹”的问题。

首先,要尽快大面积推广医疗责任险,确保在医疗事故或意外发生后,由第三方的保险机构来承担大部分经济赔偿。因为医疗服务本身具有太多的不可预测性,医疗行业被公认为是高风险行业。即使是最高明的医生,也很难绝对不出现医疗意外。鉴于这一特点,应推广“医疗执业保险”,一旦出现类似的医疗意外,患者去找保险公司,通过第三方鉴定来进行索赔,避免了医患直接面对冲突造成矛盾激化。

其次,医院服务的软件要再升级。就医消费不透明,医患沟通的渠道不畅通,就医服务时间过短,等等,这些都是当前非常突出的现实矛盾。当医疗机构总抱怨病人或其家属蛮不讲理的时候,也应该反思一下,病人为什么不愿意听你的?很多时候,问题的产生可能是双向的。

作为医者,当你觉得病人不懂、不了解你时,可能也意味着你同样不懂、不了解病人。而且,难道医院就完全没有野蛮和不讲理的一面?在发达国家,医院总要留给病人和医生足够的沟通时间,等候和沟通的过程可能就是一个冷静和反思的过程,这一点恰恰是目前很多医院缺少的。

只有安保的问题、经济的问题、服务质量的问题都得到同样的重视,并得以明显改善,才可迎来行医真正安全的那一天。 吴帅

“神医”如鱼得水 源自中医迷信

以一把芒硝“治百病”的胡万林,履历与监狱有着不解之缘。这位曾治死过市长的“神医”,每每从监狱出来,都重操旧业,害人不断,却不乏追随者。而这次他治死的,是一名大学生。该大学生用生命了结的方式,再次向世人揭穿所谓神医的真面目。

话说,刚过扫盲级文化程度的胡万林,已是劣迹斑斑。在新疆建设兵团服刑期间,治死过13条人命;1997年,他出狱的第二年,竟在陕西办起医院,再治出人命,他以“医院被取缔”为由卷铺盖走人。过后不久,胡万林竟成了《发现黄帝内经》书中几乎可包治百病的“当代华佗”,并在河南办医院,又治死了人。

身背这么多人的胡万林,2000年被法院以非法行医罪判刑15年。就在人们以为“神医”胡万林的故事该画上句号时,没想到,他竟然又回来了。这回,他又治死了人。

屡治屡死,屡死屡活。这的确是“神医”——神的不是其“医术”,而是出了这么多医疗事故后,还能游走于江湖。死了人、坐了牢,似乎未影响“神医”在一群人心中的号召力,那些拥趸们,竟未从其治死人的“神迹”中彻悟,反倒继续追随。你说这神不神?

治死了N条人命还有人追捧,这荒诞事实,是魔幻现实主义的好题材。“非法行医罪”打不倒胡万林,“治死了市长”也没法阻断胡万林的行骗之路,其生命力如此顽强,是源于“神医”善骗,迷信土壤深厚,抑或科普乏力、监管鞭长莫及?

“神医”胡万林,本可以不这么逍遥:如果法治“药性”强些,对其违法行径的监管触角更敏感些,能从法律和科普等层面着手,给“神医”来个釜底抽薪,其“功力”会不废?当社会多了双“逢神必警惕”的眼睛,“神医”们还能如鱼得水? 刘雪松



以“堵”治懒 何妨变“堵”为“疏”

据报道,近日辽宁师范大学有学生向媒体爆料,该校辅导员口头传达学校规定,“上课期间不准在寝室床上睡觉”。目前该校已有学生因违反该规定受到书面处分。

“堵”的另一面是“疏”。大学里,学生逃课常有,是下大力气严防死守,卡住学生在白天的睡眠,还是致力提升课堂品质,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已然成为区分高等教育管理水平高下的试金石。

勾画图 锡兵文

拒做“低头族”

样的感慨:“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莫过于我们坐在一起,你却在‘刷屏’。”

“低头族”的集体静默甚至为各种危险埋下隐患。据报道,上个月,大二学生Justin Valdez在美国旧金山的地铁上被射杀。监控录像显示,射杀Justin前,凶手数次掏出手枪,甚至用它擦了擦鼻子。与此同时,近在咫尺的十几位乘客都在低头看手机,没人注意到凶手。这不禁让我们感到不寒而栗,“低头族”不仅不易察觉环境的异样,更容易使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而不自知。

“低头族”的队伍正在壮大,从年轻人到中老年人,甚至孩子也在加入。干眼症、腱鞘炎、精神抑郁等各种健康隐患和可以预见的安全隐患似乎都抵挡不住电子屏幕的巨大魔力。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话似乎越来越少了,倾吐的欲望越来越不强烈了,更体会不到交流的乐趣和温暖了。美食家沈宏非在博客中写道:“人心散了,饭也吃不好了……上了微博后,我的拍菜水准蒸蒸日上,吃菜的兴致则江河日下。”朋友聚餐、家人团聚,经常因为“低头族”的存在而变得了无兴趣甚至匆匆结束。

无论是主动选择做“低头族”还是被动选择,我们都应该正确认识,网络交往不同于现实交往,更无法取代现实交往,这种间接交往毕竟没有面对面的交流和心灵与心灵的碰撞来得真实,不会产生更多情感上的交流和共鸣,由此而结成的群体关系其实并不牢固,过分依赖还会弱化现实交往的能力。所以,当你不是一个人时,请顾及一下周围人的感受,当你昂起头时,你会发现你错过了世界很多精彩的变化。 宋华

学术造假不能仅靠“退选”揭发

无疑对于促进我国的科技发展水平有着积极的意义。但同时,在“名利”的面前,即使是有着较高素质的教授,也迷失了方向。

为了能够发表论文,赢得名和利的双丰收,甚至可以更上一层楼,进入中科院,成为院士,享受更高级别的待遇。个别教授失去道德底线,科技精神,采取了造假数据、抄袭别人科技成果的方式来获取名利。

当然,新闻中被王牧教授实名举报的闻海虎教授是否造假还需要专业机构鉴定。但王牧教授以“申请退出2013年院士增选”的方式,来提醒科学道德底线的做法,在让人敬佩、感动的同时,也引发人们的思考。造假论文,难道就这么容易“光明正大”的大行其道?如果,王牧不坚守科学道德,不举报,那么闻海虎的论文问题是不是就没有人发现,那么,他是不是就能借此论文达到自己收获“名利”的目的?

虽然,论文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都是天书没人能看懂,真假自然难以分辨。但对于论文审批的机构和相关科研单位、高等院校应有人来进行鉴定,不能只看荣誉好的一面,更要坚守诚信、实事求是的科研精神,最大限度的打压假、劣、抄论文生存的空间。而不能光靠教授的良好和科学道德的“自觉”,这种现实发现毕竟不能代替完善制度的有力约束。希望王牧教授的行为,在唤醒科技工作者道德良知的同时,也能惊醒论文鉴定机构的沉睡。 王继凯

如果,王牧不坚守科学道德,不举报,那么闻海虎的论文问题是不是就没有人发现,那么,他是不是就能借此论文达到自己收获“名利”的目的?虽然,论文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都是天书没人能看懂,真假自然难以分辨。但对于论文审批的机构和相关科研单位、高等院校应有人来进行鉴定,不能只看荣誉好的一面,更要坚守诚信、实事求是的科研精神,最大限度的打压假、劣、抄论文生存的空间。而不能光靠教授的良好和科学道德的“自觉”,这种现实发现毕竟不能代替完善制度的有力约束。希望王牧教授的行为,在唤醒科技工作者道德良知的同时,也能惊醒论文鉴定机构的沉睡。 王继凯

季建业如何“攻陷”了法学院

他官至副省级,虽任途平步青云,亦不忘学海泛舟,两年前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后工作站出站,2006年于苏州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研究的是宪法学和行政法学。他心系农民权利,为之撰写博士论文一篇。若干年来,他在媒体、刊物发表文章若干篇,人称学者型官员——他是新近“翻船”的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

这是季建业被调查之前,呈现在公众和同僚们面前的光鲜一面——一个勤奋好学、专业能干的学习型好干部。

随着季建业被调查,大家看到了其另一面——身为苏州大学的校董,却在苏州大学读博士学位;博士论文被指抄袭多个学者的文章,据称是由别人代笔,博士论文答辩,本人并未到场。他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后“研究”,该校法学院又和南京市政府进行项目合作,季建业本人正是课题项目负责人。季建业做了很多研究,发表了很多文章,其中的观点却和他的施政理念恰恰相反。

季建业一面大谈保护古城风貌,一面在南京砍伐百年梧桐;他一面大谈尊重农民权利,一面又干了不知多少侵犯农民权益的事情;他一面在法学院厮混,一面又涉嫌违法犯罪。这真是有些黑色幽默的戏剧效果。

如果明事理,上述两所大学法学院就不要出来狡辩了。现在洗刷自己多么清白,和季建业是纯粹的学术关系,君子之交淡如水,那百分之五是扯淡子。

报道显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季建业还是个县处级官员,就开始了在苏州大学的学术进阶之路。1999年,季正式进入苏州大学法学院,成了一名正式的在在职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宪法学。2003年后,季建业继续在苏州大学攻读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的在在职博士课程,师从杨海坤教授。与此同时,季建业步步高升。2006年6月14日,季建业在中国人民大学获得了他平生的第一个学术头衔——人大宪政与行政法治中心客座研究员。这年也是他正式获得博士学位的一年。2009年季建业成为南京市代市长。按照时间表倒推,这位副省级官员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在人大法学院从事为期3年的博士后研究工作。

季建业“痴迷”学术,“醉心”法学,一路读到博士后,“好学”精神非常人能比拟。遗憾的是,苏大法学院没有教好自己的学生,人大法学院没有培养好自己的“研究人员”,在长达十几年时间里,这样的经历不但没有帮助季建业树立对法律的信仰,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政绩观和群众观,法学院反而被季建业一步步攻陷。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权力与学术之间的资源置换并不罕见,但不管其他学院如何,法学院尤其不能这么干。法学院不能守住学术的底线,法学的学术头衔可以交换,甚至私相授受,也就击穿了法律应该被信仰的底线。

季建业或许真的非常喜欢法学,但最后却让大家觉得,法学和这个人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季建业当然要依法处理,但这位法学博士的学术发家史却实在不忍卒读。 于德清